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七月派作家研究卷

江声浩荡七月诗

张业松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七月派作家研究卷

江声浩荡七月诗

张业松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声浩荡七月诗/张业松编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七月派作家研究卷)
ISBN 978-7-100-15483-3

I. ①江… II. ①张… III. ①“七月”诗派-作家-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96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江声浩荡七月诗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七月派作家研究卷
张业松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83 - 3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5.25
定价:70.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	贾植芳	001
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	陈思和	009
文艺与政治的撞击	吴中杰	032
“给他们许多话”:胡风、路翎与鲁迅传统	郜元宝	085
与名教相搏:以鲁迅与胡风的经验为中心	金 理	096
射击与坚守:胡风的狱中写作	刘志荣	109
语言与“实感”		
——从胡风的一封家书谈起	金 理	130
以想象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胡风《时间开始了》的一种解读方式	梁燕丽	141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为《路翎文论集》而序	贾植芳	15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张业松	162
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		
——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	张新颖	176
“一生两世”与强制遗忘		
——关于“路翎叙述”的叙述	张业松	192
路翎晚年的“心脏”	张新颖	204

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章培恒	216
也说贾植芳先生	许道明	218
把“人”字写得端正		
——记贾植芳先生	吴中杰	222
五年来的思念	陈思和	227
贾植芳与中国比较文学	严 锋	234
重读贾植芳《周作人新论》一文的感想	陈广宏	240
在风雨咆哮的狱里狱外	陈鸣树	245
活出来的真正知识分子		
——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严绍璁等学者忆贾植芳	李 楠	249
战区“风景”与文本三重性		
——东平佚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	张业松	265
诗与一代之事		
——关于诗人冀汭、《诗垦地社丛刊》及其他	段怀清	282
如何当家？怎样做主？		
——重读鲁煤执笔的话剧《红旗歌》	陈思和	295
地火在运行		
——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	刘志荣	310
舒芜的两篇“佚文”		
——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	张业松	325
苦难中的坚守与个人主体性的回归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胡风冤案受难作家的潜在写作 ...	刘志荣	350
彭燕郊晚年心境与诗境		
——以一组诗与一首长诗为例	李振声	365
谁愿意向美告别？	李振声	379
编后记		395

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

贾植芳

胡风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因为他的文艺思想而受难，也因为他的文艺思想而永生。在中国，50年代以后的受难者有许许多多，现在大多数人都已获得平反昭雪，但对胡风来说，他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意味着他个人在政治上、品性上的清白得以证明，也不仅仅意味着因他的关系而受株连的上千个善良无辜者的灵魂得以安息，还有，胡风的平反意味着胡风的文艺思想将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1949年以前写的九本著作重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50年代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提交的“三十万言书”，于1988年也由《新文学史料》重新刊发，胡风的文艺思想30年以来第一次不带一点“罪孽”色彩地袒露在当代年轻人的面前，使人们终于发现，文艺史上许多因为后来的历史大劫难和血的教训迫使当代人认真反思的尖锐问题，譬如如何区分现实主义与政治工具？如何在创作中体现大写的人的力量？如何借鉴与引进外来进步文艺的营养和批判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如何反对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腐蚀？如何冲破“重大题材”的理论束缚而深入日常生活？如何从生活中去把握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性而反对去写神化的英雄人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文坛上的理论工作者迫切、严肃地思考的问题。但是，早在这位蒙冤含辱的老人30年以前的文艺思想里，这些问题就已经引起了足够的深思，并在理论范围内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探讨。某种意义上看，胡风文艺思想给当代文坛带来的震动，比

胡风本人以及胡风冤案的传奇性与动人性更要壮观得多,也正是这个原因,胡风文艺思想比胡风本人更不容易获得某些人的宽容,以至使胡风文艺思想的平反比他在政治上的平反要整整迟到8年之久。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6号文件,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平反的基础上,又对他的文艺思想、宗派诸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新的说明。文件宣布撤销原来文件上对胡风关于“五把刀子”的说的指责,并明确指出,胡风文艺思想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双百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这就意味着胡风文艺思想又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国内的理论界展开平等的自由的讨论了。但是我们,特别是作为胡风的朋友,又同是受难者的我们,又不能不由衷感到这个文件来得太迟一些了,因为作为当事人的胡风在这个文件下达时已经去世3个年头了。如果他能够活着知道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取得了他一贯视为精神支柱的党的理解与谅解,他该会有多么高兴。

不过,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因这个文件的迟到而停止他们在学术上的探索和思考。早自1981年起,陆陆续续的,国内学术界就开始发表重新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最早是在江苏的《雨花》杂志上,发表了吴调公的《关于胡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介绍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第二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胡风“民族形式”理论的争鸣,到第三年(1983年),《苏州大学学报》发表胡铸的《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总算正面接触到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当然,这些文章基本上还是属于“拨乱反正”,为胡风洗冤性质的。以后又出了许多研究、阐释胡风文艺思想,并且通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的经验教训,深入揭露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给文学创作带来的严重危害。有些文章谈得很深入。譬如《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上发表的支克坚的《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钱理群的《胡风与五四文学关系》、艾晓明的《胡风与卢卡契》以及一个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的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陈思和的《胡风文艺理论的遗产》,以及辽宁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梁振儒、顾荣佳编的《披荆治林者的足迹》，收入了从1985年到1988年间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理论文章；此外，湖北出版的《湖北作家论集》，三辑里，每辑都收入了一些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文章；这一些文章，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初步成果。

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面面观，这些论文已经有了很好的阐释，我在此不必重复。我就以个人感受简单地谈一些对胡风文艺理论的解释。胡风的文艺思想比较复杂，又多是针对了30年代到50年代文坛上的实际斗争而发的，所以非局内人、或者非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人，一般不一定弄得清楚。特别是因为胡风不是个纯粹的理论家，他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人，在他的理论表述中，夹杂着许多他自己创造的，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界定，却带有很浓重的主观愿望色彩的词汇，像“自我扩张”“自我斗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血肉的现实的人生搏斗”，等等。本来一个理论家创造出特殊意义的词汇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使自己的理论表达得更准确，并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胡风所处的年代，正是文化水准普遍低下，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一般人，甚至是文化工作者，面对着从抗战到建立新的政权这一时代的大变动，根本无法从直感上把握住时代，他们只能紧紧依靠一些流行的理论术语和理论的“本本”，按图索骥地去摸索时代到了怎样的一步。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理论的术语都被注入了固定的政治含意，像“无产阶级”就代表好的，“资产阶级”就代表坏的，“唯物主义”就代表正确，“唯心主义”就代表错误，这样就很容易记住，按照这些含义简单的名词来思考问题，一方面使人人都变得懂政治，懂哲学，懂文艺，另一方面，政治、哲学、文艺的复杂内涵都被简单化、庸俗化了。而胡风所创造的一系列含义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完全不属于当时所流行的这套理论术语系统，所以它们无法被一般的人，甚至是担任各种领导工作的人所理解和认同。于是，人们就把这套新名词新概念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文艺思想，都视之为异己。就好像古代有一个寓言，一个地方的猪都是白颜色的，于是当地人人都认为猪只能是白色的。后来有客人从别的地方带来一头黑猪，尽管它确实是猪，却谁也不承认它是猪，

反把它视作妖孽。胡风的文艺思想当时就有这种被人们认为黑猪不是猪的处境。尽管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胡风都是一个努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始终努力地要把自己的文艺思想与当时时代以及共产党对文艺的要求融合起来。

譬如说，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什么呢？通俗些讲，就是作家的一种战斗的人生观，一种战士的“人格力量”；从创作实践来说，就是作家在认识和表现现实生活时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它包含着作家对人生的强烈的爱憎态度。胡风所指的“战斗精神”也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发动所领导的历史大斗争爆发出来的产物”^①。也就是指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现实环境下的伟大实践精神。如果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一般人都会认同，但胡风偏偏用只属于他个人的语言来说出这个意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因为胡风提倡文学创作要高扬“主观战斗精神”，这里面有“主观”两个字，人们就认为你提倡“主观”，就必然反对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你既然提倡“主观”，那就是提倡“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错误的，那么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错误的，这种荒诞的解释和荒诞的引申，在当时却顺理成章。

还有，胡风曾提出文学要写出人的“精神奴役创伤”，什么是“精神奴役创伤”呢？其实就是“缺点错误”，文学要写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当然要写人的缺点。广大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受着上千年封建主义的物质压迫和精神压迫，受着小生产私有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精神上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被奴役的痕迹，像阿Q，当他被人出卖，将送上法场时，他还在努力地画一个签押的圆圈，还为画得不圆而伤心，这种麻木、愚昧、自卑，集中地表达出封建意识形态对一个落后农民的毒害，把这个细节写出来，产生了震撼人生的艺术效果。鲁迅把这种缺点概括成“国民性”，胡风进一步具体化，称之为“精神奴役创伤”。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胡风自己有个解释，他说：“在科学分析上用‘缺点’去指

^① 《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收入《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

明,但在创作上一定要用‘创伤’去感受。”^①胡风用的是形象思维,他的概括集中表达了鲁迅在著名杂文《春末闲谈》里描绘的一种现象,鲁迅说,有一种细腰蜂,它用毒针刺在小青虫身上,让小青虫处于不死不活麻木状态,然后就在小青虫身上产卵,等卵变成幼虫时,就靠食小青虫为生。鲁迅认为数千年来统治者就是这样用封建意识毒化了人民,使人民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为统治者所奴役。胡风正是从这一形象延伸出“精神奴役创伤”,认为在劳动人民身上,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所造成的“创伤”,进步文艺就应该像鲁迅那样,挖掘出这种创伤,使人惊醒,克服这种“创伤”而走向新的人。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就连毛泽东也说过,对人民群众的缺点错误不是不能表现,当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正受到成千成万的研究者颂扬,但是胡风这个提法却受到了许多人无情的攻击,他们认为,胡风既然提出要写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那么就是反对写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就是丑化人民。

这样一些例子还有很多,胡风的每一个观点当时几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现在仔细看起来,胡风的理论和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体系,50年代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在概念术语上望文生义的错误解释,任意地夸大本来就是由批判者自己造成的理解上的错误,并把这种错误强加到胡风身上。这看上去很荒诞,但在当时,这场荒诞剧是用很严肃的态度去演出的。其实,胡风在理论表述上运用大量新的名词概念并不是胡风的错,正相反,这表现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特点,胡风自觉地在实践中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努力去把握时代的本质,但他从没有把这些新获得的理论感受立刻照搬到他的理论中去,按一般的本本主义者那样,照抄一些教条了事,当胡风亲身感受了时代的进步与理论的进步以后,他就努力从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出发,创造出活生生的理论语言,让他尽了力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化到个性化的文学语言中表述出来。因此,胡风的理论,既阐释了马克

①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思主义的文学基本原理,又融合了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与体会。他是将一个时代的统一的政治语言转化为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表述出来。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文化要求恰恰相反,那是一个走向统一的时代,文化上要求千姿百态的个性统一到一个时代声音中去,而不是将一个时代声音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个性加以表达。时代对个人的文化要求与胡风对时代精神的独特追求逆流而行,这就使本来很正常很富有个性的文学理论语言变得非常刺耳,其结果是胡风成了他的语言的牺牲品。

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胡风的文学理论语言的与众不同,正暗示了他的理论本身也潜藏着内在的矛盾,因为胡风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追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引的、由苏联以高尔基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实践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这一点他与大多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别无二致。正因为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苏联初期“拉普”派给中国左翼文学所带来的教条主义影响,抗战以后日益趋向正统地位的政治工具论,等等,都不能不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发生影响。但这时候胡风就表现出他独特的个性:他没有在服从并献身于一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同时,完全放弃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他需要从自己独有的感受中来理解这个世界,宁可在感情上经历可怕的甚至是痛苦的折磨,也不轻易放弃思想的权利来换取个人前途的辉煌。这种矛盾冲突对一个真诚的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他要表达出这种不同于时代风气的声音,只能选取那些与众不同、饱含着个人感情色彩的,而在政治明确性上又措词含混的新名词概念,企图把他的感受通过文学语言直接地表述出来。正如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他不用“作家对生活的立场、态度和思想感情”而取“主观战斗精神”,不用“劳动人民的缺点错误”而用“精神奴役创伤”,很明显,前二种术语是政治语汇,而后两种术语是文学语汇,前两种术语在政治批判上是清晰的,但在个人感受上缺乏情感色彩,而后两种术语在政治定义上较模糊,但在文学上感情是强烈的。以后一组对比作例子,“缺点”是一个抽象的客观现象,而“创伤”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甚至会

产生痛感的一个名词,主观性就突出了。胡风正是通过这种名词语言上的革命,力图使自己,也使文艺理论,从冷冰冰的政治教条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成为活灵灵的与时代、与人民呼吸与共,但又保持了鲜明文学特性的“这一个”。

这就是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与当时占时代正统地位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所不同的地方。如果从历史渊源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队伍中的两种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冲突的结果。胡风曾说过:“从我开始评论工作以来,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①但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以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而言,现实主义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在20年代“革命文学”中形成的,又被30年代左翼文学所继承了的现实主义,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文学者应当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件和人物,努力创造民族英雄和卖国者的正负典型”^②。或可以说,这种现实主义所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斗争,是为了更好地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条现实主义的路,从理论上讲也就是所谓反映“本质”论;另一种倾向的现实主义则是胡风所主张的,虽然他并不反对文学要反映现实的斗争,但他考虑更多的是人的因素,即怎样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进一步发挥人的主体性的能动作用。从理论上讲,这条现实主义的路也就是体现了“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精神奴役创伤”的道路。两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条出发点是政治,另一条出发点是人学。胡风把人的强烈因素注入了文学,注入了现实主义,这恐怕就是他的理论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所以看来,胡风的文艺思想是相当有意思的,从胡风主观上来说,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的文化要求融化到自己独特、真实的感受中去,并用独特的文学理论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但客观上,恰恰是这种独特的表述,使他的理论与时代的文化要求格格不入,被视作异己,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反过来

① 《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评论集》(下),第407页。

② 《周扬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看,也正是这些以人为出发点的独特感受,使胡风的理论至今仍有价值,今天的人们总是把胡风的名字与“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等理论联系在一起讨论,这是现代文艺理论史上很少有的荣誉。胡风的文艺思想给他本人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幸运,这个问题只能交给以后的文学史去讨论。

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很丰富的,它对知识分子如何在群众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对写真实的呼吁,对民族形式的讨论,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内容,在我前面介绍过的一些学术文章和论集里都有详细介绍,如果诸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来看。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是作者 1990 年 10 月赴日访问讲学时的讲稿之一)

原载《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

陈思和

胡风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是从对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两种非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开始的,正如他在1984年写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一文中重申:“从我开始评论工作以来,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的发展过程。不久,我就达到了一个理解: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在两种似是而非的不良倾向中进行的,一种是主观公式主义(标语口号文学是它原始的形态),一种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是它的前身)。……我以为,现实主义是在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中发展的,也是非在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中发展不可的。”^①虽然这是他针对1948年所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而说的,但把它看作是胡风对自己一生从事的文艺批评道路的总结,也不为过。他一生所追求的,正是现实主义如何摆脱笼罩在左翼文艺——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上的庸俗社会学影响,使其成为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实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上的理论指导原则。

何谓主观公式主义?它的特征是夸大了思想意识的能动性,满足于主题上表现一个现成的革命原则,以此套用生活,图解生活,使绚丽斑斓的生活实际变成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恋爱”和那种用“杀、杀、杀”来形容革命描写革命的创作

^① 《〈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408页。

倾向,正是主观公式主义的原始状态。

何谓客观主义?胡风认为是作家主观上对生活所采取的冷漠态度,表现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时,作家对描写的生活对象缺乏强烈的爱憎与热情。它与自然主义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冷静地以生活材料去编织某种解释生活现象的理论原则。在自然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里,这种原则表现为遗传规律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客观主义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社会科学理论作实用主义的图解。如茅盾《子夜》的结尾改动就是典型的一例。^①

主观主义强调主观上对革命原则的拥护和宣传,客观主义以生活素材来图解革命原则,同样起着宣传的功能。这两种表面上是截然相反的创作倾向却代表了同一种思潮:以抽象的革命原则来取代对客观社会生活的真切认知,依靠现成的思想原则来取代作家个人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审美感受。由于它们都把表现“革命原则”奉为至上,常常使人误解为是现实主义要求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提示。对于左翼文学运动是战斗的文学运动,它的形成本身就是国内阶级斗争落实在文学领域里的产物,历史任务规定了它在发展自身的文学运动时,必须与正在发展着的政治斗争,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取得了一致的步调,成为后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响应者和鼓动者。出于实际需要,左联领导人选择了现实主义作为他们的创作指导原则。现实主义要求文学在本质上把握时代发展的总趋向,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在实用的支配下,“时代本质”“历史规律”很容易被理解为现实政治斗争本身。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者倡导的“无产阶级精神”,还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理论原则,到了左联时期,就自然而然地转变为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原则,政策和方针,要求文学把这些原则,政策和方针当作现实历史规律的主要符号加以表现和歌颂。这样,原

^① 据茅盾的《回忆录》说,《子夜》原先创作大纲的结尾是资产阶级两派在庐山握手言和,并互易情人纵淫,以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后经瞿秋白建议,把赵、吴两个集团的最后结局改为一胜一负,“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引自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子夜》里,人物并没有自在的生命力量,只是作家图解观念的道具,可以任意摆布。